

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经过 / 宫力 周敬青 张曙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 于化民

回忆邓小平在江西新建的一段日子
——访问罗朋谈话录 / 熊敏 梅颢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复出的那段历史 / 孟昭庚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 / 霞飞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经过 / 程中原

的复出 / 毛毛

23 读·党史 第23辑



邓小平“三落三起”

陈澍 / 编

23

读·党史
第23辑



邓小平“三落三起”

陈澍 /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三落三起”/陈澍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 5
(读·党史)

ISBN 978-7-5098-2993-6

I. ①邓… II. ①陈… III. ①邓小平(1904~1997)—生平事迹
IV. ①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3774 号

启事:本书选用的部分文字、图片,来源于各正式出版物。其中还有部分作品尚未与有关作者、编者取得联系,我们深感不安。恳请有关权利人联系我社,我们将按《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支付稿酬。
(联系人:贺冬英 电话:010-82517196)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领衔编辑:潘 鹏

责任编辑:吕佳音

复 审:潘 鹏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增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45mm×210mm 1/32

字 数:115千字

印 张:5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2993-6

定 价:12.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目录

CONTENTS

► 第一次落起

- 1 邓小平在苏区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批判 /曹仲彬
- 11 邓小平与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
(节录) /傅伯言 余伯流
- 21 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经过
/宫 力 周敬青 张 曙
- 29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于化民
- 42 王稼祥力助邓小平第一次复出 /邓寿明

► 第二次落起

- 46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打倒经过
/杨 俊
- 60 回忆邓小平在江西新建的一段日子
——访问罗朋谈话录 /熊 敏 梅 颢
- 66 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
/巫 猛 熊 诚 李小川

目录

CONTENTS

76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复出的那段历史

/孟昭庚

86 义重情深的革命战友

——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交往 /刘武生

▶ 第三次落起

98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

/霞 飞

115 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再次落难 /薛庆超

126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之后 /霞 飞

131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经过 /程中原

140 光辉的复出 /毛 毛

146 叶剑英与邓小平的复出 /梅 叶 王洪飞

156 编辑手记 /吕佳音

邓小平在苏区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批判

/曹仲彬

1929年底至1930年初，邓小平在广西发动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了左、右江苏区。后来，中共中央派他到中央苏区工作。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邓小平因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而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撤销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邓小平在打击迫害面前，没有畏惧和屈服，而是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勇敢的抗争。

纠正肃反中的“左”倾错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各

苏区进行了镇反和肃反，这是必要的，但在执行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左”倾错误，30年代初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就是错误肃反的一例。

1931年1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为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三位革命领袖举行了大会。会上红十二军的吴拙哉等十几名指战员错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本来，对于这些没有文化而又缺乏国际共运知识的一般干部战士来说，是不足为奇的。但闽西党的“左”倾领导人以此为契机发动了一场肃反运动，制造了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的冤案。这一运动

很快波及并影响到邻近的赣西南瑞金县。当时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兼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李添富等人无中生有，断定瑞金县里存在着庞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并要坚决肃清它，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瑞金革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原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等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当成“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加以逮捕和杀害，不少人受到株连。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就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先在闽西巡视，后被派往瑞金调查处理肃反问题。1931年8月邓小平来到瑞金时，县苏维埃工作停顿，干部情绪低落，群众存在不满情绪，全县笼罩着一派恐怖气氛。如邓小平所说，当年“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

不久，根据上级指示，重新组织中共瑞金县委，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此后，他深入基层和农村，听取干部和群众对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反映和意见，调查研究那些肃反对象，特别是被杀

害者的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果断地停止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对那些在押人员作了细致的审查，很快把蒙受冤屈的干部和群众释放了出来。邓小平根据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经过调查，掌握了原县委书记李添富等人对这次错误肃反造成恶果的事实，果断下达命令，拘捕了制造冤假错案的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等人。

1931年9月，邓小平在瑞金锦江中学亲自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肃反工作、优抚工作、劳动法、组织消费合作社等议案，选举了新一届的县苏维埃领导人。公审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谢在权。会后，又逐步建立县属以及壬田、桃阳、武阳、安吉、城关等单位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吸取这次肃反的教训，健全了各级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在县城和壬田、武阳、安吉等乡村

召开群众大会，为肃错的干部平反。在瑞金县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推动下，“全县的局面大为改观”。

1932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瑞金县的工作进行检查，4月4日作出《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其中指出，“革命秩序相当建立”，“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人偏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转变”，瑞金县“在某些工作上面有相当的进步”。这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邓小平在瑞金县纠正肃反错误的肯定和评价。

抵制土地革命中的“左”倾分田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一条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正确土地革命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一条错误的“左”倾土地革命路

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不同意这条“左”倾土地路线的同志，便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进行批判。

邓小平在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曾以中央苏区为榜样，按人口为标准进行平分土地，实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邓小平“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

为正确地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曾和韦拔群一起在东兰县一带，深入群众、实地考察农民土地情况。他还到韦拔群的家乡东兰县武篆镇东里屯，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研究土地革命等问题，并在此开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亲自给大家讲述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接着，邓小平又同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人开会讨论和研究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他向大家

介绍了红四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命对开创和建设右江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其中吸收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土地革命的经验，诸如“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在分配土地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此后，右江的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这遭到了党的“左”倾领导者的反对。1930年8月，李立三“左”倾中央南方局，派邓拔奇等人到右江革命根据地检查工作，指责邓小平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在执行“右倾富农路线”。

邓小平到中央苏区后，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和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仍坚持实行毛泽东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正确分配土地政策。他在瑞金开展土地革命期间，组织贫农团，发动农民起

来没收地主土地，把没收土地分成甲、乙、丙三类，以原耕地为基础，实行好坏分匀，多少分匀的原则；并规定允许各区乡留一些好田为红军公田，收益归公，用于扶持红军和军属以及救灾等。据当时记载，邓小平在领导分田时使“雇农独立劳动者分上田，中农分中田，有的雇农分上田，贫农中农平分”，“有的地方，富农还分得好田，或三分之一的好田”。然后依“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再行调整，使土地的分配和使用趋于合理。邓小平还认为分配土地，往往“一次是分不好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要经过三四次以至好几次”。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以劳力的强弱作为分配土地标准的“左”倾土地政策。

由于邓小平在瑞金等县实行了毛泽东的正确土地路线，抵制了“左”倾的错误分田政策，从而使瑞金等地土地革命顺利开展，取得了较大成就。

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抵制“左”倾的“城市中心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着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经验，主张在中国走俄国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结果使革命屡遭挫折。

1930年6月11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月，“左”倾中央南方局派邓拔奇到右江革命根据地去贯彻其“左”倾路线与冒险计划。邓拔奇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中城市，配合中央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计划。9月，红七

军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发生激烈争论。当时，邓小平根据红七军的实际情况，对攻打柳州等大中城市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几千人的红七军，在百色起义后，都未能守住百色，现在怎么有能力去攻打柳州等大中城市呢，这是没有把握的，也是困难的。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反对出去攻打大城市，主张坚守右江苏区。而邓拔奇及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则坚决主张贯彻中央攻打中心城市计划，并压制与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甚至以违背中央决议为名，撤销雷经天的职务，后又将其开除出党。

后来，红七军在向柳州进军途中受挫，全军上下对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产生怀疑。1931年1月3日，邓小平在全州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围绕“攻不攻打桂林”问题展开争论。邓小平提出立即放弃攻打桂林计划，遭到邓拔奇、陈豪人、龚鹤村等人的反对，却得到多数人支持。最后前委决定放弃攻打柳

州、桂林，部队先在全州休整。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等人借口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部队。之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在桂、粤、湘三省进行艰苦转战，最后前委决定部队转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去“汇合朱毛红军”。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后，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有了新的提高，更加坚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认为，在中国国情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不可能的，只有向着高山和穷乡僻壤，那里没有敌人或是敌人力量弱的地方”。他的这个思想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一致的，同“左”倾的“城市中心论”是对立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反对当时“左”倾中央提出的攻打赣州、向中心城市发展的错误指示，认为红军应留在苏区清除威胁大的地主土围子，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以便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王明“左”倾中央因而指责邓小平等“打赣州的时候，

他们袖手旁观的讥笑，对党的指示的工作，完全怠工”，是对抗党的主张。打赣州，是当时“左”倾中央“城市中心论”的突出表现，邓小平等人能够公开大胆抵制这种错误主张，实属难能可贵。

反对“左”倾的“进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及其应采取的军事战略方针，“左”倾中央不顾客观实际，主观地认为是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然后夺取政权取得全国性胜利；在军事战略方针上，强调阵地战与正规战，主张“全面出击”、“御敌人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

邓小平由于反对和抵制这种“左”倾的进攻路线与军事战略方针，拥护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而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错误批判。

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邓小平

认为,当时处于“革命斗争低落”时期,敌强我弱是事实,不具备“直接的革命形势”。党的任务是根据形势发展而确定的,革命“只能是土地革命”。这就否定了全国革命形势处于高潮的错误判断。邓小平进一步认为,“左”倾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对革命任务的规定为“进攻路线”,“是建立在群众革命斗争低落上面的理论”,是“不了解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而建立在革命低落上面的所谓“进攻路线”,只能是脱离客观实际,没有坚实基础的,这必然是冒险主义的,会遭受失败的。实际上邓小平是否定了“左”倾的“进攻路线”。因此,党的“左”倾领导者指责邓小平这是“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的悲观失望”,是“不相信群众力量”,是“对进攻路线的怠工”。

在军事战略方针上,邓小平主张“诱敌深入”,把敌军引到群众基础好的苏区举而歼灭之;反对把红军拉到白区去硬拼或者把敌军挡在苏区大门外进行“堡垒

战”。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左”倾领导人主张打出苏区到白区作战,邓小平与毛泽覃等则主张应把红军部队调到兴国一带或河西(赣州以西)去集结,反对把队伍拉到白区去硬拼。

“左”倾领导者却指责邓小平等是“退却逃跑”,是“根本不相信红军有力量在白区消灭敌人”,是“单纯防御路线”。

邓小平被王明“左”倾中央扣上“右倾退却逃跑”的帽子,进行批判与打击,其主要借口就是“寻乌事件”。经过是这样的: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趁守卫在中央苏区南部红军独立三师开赴赣东北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发动建黎泰战役的机会,乘虚向中央苏区南部进犯。邓小平当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他立即召集三个县的党政军领导举行联席会议,研究对敌之策。会议经过分析讨论,决定“有计划的准备退却”,诱敌深入,以便趁机歼敌。会后邓小平便率领会寻安三县广大军民“坚壁清野”,“布置

后方”，“有计划的准备退却”。结果，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寻乌县被陈济棠部所占领。这就是所谓“寻乌事件”。邓小平这些战略战术，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诱敌深入”和游击战作战原则具体体现。可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眼里，这是违背“进攻路线”的，是丢城失地的逃跑行为，罪不可赦。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后，发动反“罗明路线”，抓住“寻乌事件”大做文章，批判邓小平在敌军大举进攻面前，“将整个寻乌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是“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后将他撤职调走，重新改组中心县委。历史证明这不是邓小平的过错，恰是他的功绩。

对批“江西罗明路线”的抗争

由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与抵制“左”倾错误领导，所以，临时中央发动反“罗明路线”运动刚开始，就被打成了“江西的罗明路

线”。对此，邓小平没有屈服和畏惧，先后进行了三次英勇的抗争。

1933年2月22日，苏区《斗争》杂志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点名批评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继之，在临时中央的压力下，中共江西省委先后发出《给会寻安三县的指示信》和《关于公布永公泰工作决议和给会寻安三县委指示信的决议》，其中也批评邓小平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这“是与罗明路线同一起来源”的“机会主义”。可是，临时中央竟然对于江西省委指示信和决议非常不满，指责省委“对于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是在帮助邓小平逃避责任。

接着，由苏区中央局出面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议指责邓小平是“机会主义领导”，中心县委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并作出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

在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会间还对邓小平进行了批判，责令其向中央局写出《会寻安工作检查》。会后，邓小平被撤职调任省委宣传部长，改组了中心县委。

邓小平在长篇的《会寻安工作检查》中，同“左”倾路线进行了第一次抗争。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进攻路线建筑在群众革命斗争低落上面的理论”。“检查”对指责他的所谓“纯粹防御路线”解释说，“防御路线”中的“诱敌深入”等，是正确的军事原则和方针。它不是单纯地为了防御而防御，而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

对邓小平《会寻安工作检查》，临时中央领导大为恼火。《斗争》发表题为《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逐条地对“检查”进行“批判”，指责它是“一大篇糊涂的哲学，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是“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这期《斗争》还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把邓

小平等人由“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升级为“江西罗明路线”。

与此同时，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也被指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毛谢古反党派别小组织”，而受到打击。为了把批“江西罗明路线”推向深入，中央局又于4月16日至22日在江西博生县，召开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名曰总结工作，实际是批判邓小平。会间，进一步把邓小平同所谓“毛谢古反党派别小组织”联系起来，指责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被统称为“邓毛谢古”，并对他们进行了更激烈的批判。诬蔑他们为“怪物”，“不相信党和群众力量，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悲观失望，对敌人大举进攻表示惶惶失措”，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是“完全与党的进攻路线相反”，等等。

在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起，进一步陈述了他

们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和观点，对“左”倾路线进行了第二次抗争。

会间，“邓毛谢古”被责令先后两次提出申明书。他们在申明中，据理驳斥了对他们的一些指责。首先他们申明没有进行过“反党的小组织活动”，仅仅是私下交换过一些意见而已。邓小平说，我“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并且不承认自己“右倾”，说“反右派与他没有关系”；最后坚定地表示要“到实际工作中去”，在实践中检验谁对谁错。会议总结亦承认，“邓毛谢古”虽受到了“严重打击”，但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

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对没有屈服的“邓毛谢古”采取了新的措施，邓小平对“左”倾路线又进行了第三次抗争。5月4日，临时中央授意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声言“邓毛谢古”“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

的队伍”。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以中共江西省委的名义作出了《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说“邓毛谢古”的第二次申明书与第一次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指责“邓毛谢古”还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决议还给邓小平加上了新的“罪状”，责令要他交代所谓“在红七军所执行的立三路线和擅自脱离红七军的行为”等问题，要“邓毛谢古”写出第三次申明书。同时对“邓毛谢古”分别作了组织处理。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此后临时中央对邓小平的所谓在红七军所执行的立三路线和擅自脱离红七军的行为进行正式审查。对此，邓小平再次提交了书面报告，进行申辩和抗争。临时中央审查了一阵后，便不了了之地结束了审查。实际上邓小平的抗争取得了胜利。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

邓小平与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节录）

/傅伯言 余伯流

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4年多的政治生涯，是一段光辉而曲折的历史。在此期间，他为创建地方红色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却又历经坎坷，大起大落。

邓小平入赣与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缘由

邓小平是1931年2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时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根据时势需要，与军长张云逸等一道奉命率领红七军千里转战，从广西到江西，“汇合朱毛红军”。1931年2月14日（农历腊月27日），邓小平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辗转抵达赣南崇义县城。随即，部队帮

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发展武装力量。3月10日，邓小平根据前委的决定，从崇义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却受到王明“左”倾领导者的冷遇。是年8月初，邓小平经中央同意，偕金维映从上海回到江西瑞金，随后与谢唯俊（中共赣东特委书记）、余泽鸿（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派往苏区工作）、霍步青（苏区中央局巡视员）等会合。经商议，大家“推举”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上任时，瑞金正在“肃反”，县苏维埃政府和总工会“两个单位80%的干部被抓起来了”，“绝大部分作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处决”，连瑞金前任县委书记



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

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萧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等重要干部亦被杀害。“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邓小平临危受命，处事稳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洞察事实真相，果敢、及时地制止了乱捕滥杀的行径，使全县300余人免成刀下之鬼，并公审处置了始作俑者原县委书记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添富，为一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平反昭雪。随后，邓小平领导全县干部深入开展土地革

命，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培训干部，创办《瑞金红旗》，建设红色政权，“全县局面大为改观”。邓小平主政瑞金后出现的稳定政局，为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下决心在瑞金“建都”奠定了坚实基础。1931年11月上旬，瑞金召开“全苏一大”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期间，邓小平主持承办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与会代表的膳食住宿和物资供应，组织群众举行“提灯晚会”等热烈的庆祝活动，受到中央政府领导人的交口称赞。“那时苏区的工作，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10个月后，于1932年5月下旬调任会昌县委书记。一个月后，江西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加强中央苏区南线工作的指示，决定建立会寻安中心县委（亦称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与邓小平相熟的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将这一重担托付给邓小平。1932年6月下旬，会寻安中心县委在会昌